

竹內好的中國觀

• 鈴木將久

一

1945年日本戰敗後被美軍佔領，直到1952年才取得法律上的獨立。然而，這一段時期日本思想界卻相當活躍。因為當時日本從戰前法西斯式的思想壓抑下解放出來，而且冷戰格局還未確定，美軍確實給予民眾自由討論的空間，導致日本思想界出現很高的自由度。當時最基本的問題是反省戰爭；換言之，是認真反省自己所犯的歷史錯誤。當然，反省戰爭的路子很多：有的批判日本的社會結構，有的批判政府的政策，也有的批判一切戰爭行為。當時，各式各樣的反省在日本社會裏引起很重要的作用。但從今天的視野來看，這些反省顯然有一定的限度。第一，他們討論的無非是日本一國的問題。日本戰敗後被聯合軍重新界定國界，結果，戰後日本政府放棄了大部分殖民地。這個措施也影響到思想界的動向，他們放棄了殖民地問題的思考，只在日本「一國」內部考慮問題。第二，日本思想界大多是引進西方思想作為反省戰爭的資源。這本來無可厚非，但其態度的背

後透露出信仰西方思想、忽略鄰邦關係的心理。思考對亞洲的戰爭責任時，抱持某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態度會遇到嚴重的問題。

竹內好則在這樣的思想空間之中，提出了非常獨特的觀點。他一貫以中國為思考的基點，專心地思考越出一國範圍之外的問題，同時避免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1951年，他在《文學》雜誌的座談會上，討論戰爭期間法國的抵抗文學時提到^①：

我總覺得人們好像抱着一個願望；有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法國，我們想盡量接近她，從而，人們把抵抗作為憧憬來接受，不以自己的問題來談論法國的抵抗運動。我之所以說起這樣的話，因為法國的文學介紹得全面，但中國的沒有被介紹過。法國與中國，一個是統治殖民地的國家，一個是被統治的國家，位置相反。儘管兩國都開展過同樣的抵抗運動，卻只讚美法國的抵抗運動，對中國的抵抗運動則不感興趣，這顯示出日本人對抵抗運動的態度肯定有根本性的缺點。……

1945年戰敗後，日本從戰前法西斯式的思想壓抑下解放出來，當時思想界最基本的問題是反省戰爭，大多是引進西方思想作為反省戰爭的資源，透露出信仰西方思想、忽略鄰邦關係的心理。竹內好則在這樣的思想空間之中，提出了非常獨特的觀點。他以中國為思考的基點，避免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

* 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趙京華先生幫助修改本文，在此特別表示感謝。

把中國文學介紹給日本時，只有先改變日本人的心理才能正確地讀懂中國文學；反過來說，只有中國文學的介紹導致日本人的心理改變，才會有意義。

這兩段話表明了當時竹內好最根本的態度：他一方面尖銳地質疑信仰西方文化的心理狀態，另一方面試圖通過引入中國問題，改變日本思想的深層結構。他之所以能夠保持這樣獨特的態度，其根源在於他對中國，尤其是對戰時日本在中國犯下的歷史錯誤所抱的深刻反省態度。顯然，竹內好的思想課題符合當時日本思想界的主流意識，他也努力反思戰爭責任、批判日本社會結構，只是他凸出中國視野，從而得以打破佔領時期日本思想界的內部邊界。

1950年代初，竹內好出版了兩本評論集——《現代中國論》和《日本意識形態》。《現代中國論》一書專門收錄竹內好討論中國問題的文章；《日本意識形態》一書則主要討論日本知識份子的問題。竹內好認為中國問題和日本知識份子的問題有非常密切的聯繫^②：

為了從戰爭的體驗中重構自己，戰爭回來後，我有意識地重讀一遍魯迅。結果寫成了一本著作《魯迅》和收錄在《魯迅雜記》中的一些散文。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把通過魯迅思考的問題應用於別的對象或領域，就寫了一些評論。戰後幾年中寫下來的評論文章，後來分別編成《現代中國論》和《日本意識形態》。

由此得知，這兩本著作其實表現了相同的問題意識：為了認真反省戰爭的歷史經驗，引進以魯迅為中心的中國

視野，從而試圖改變日本知識份子的思想結構。

竹內好不僅針對當時思想界的主流意識，還批判包括日本的中國學，尤其是主張把中國學和當前思想課題分開看待的學院派。在竹內好看來，中國問題和當前日本的思想課題是分不開的，因為現代日本的歷史經驗離不開中國問題，處理好日本在中國所犯的歷史錯誤，才能推動日本的發展；同時，將中國問題看待為日本的思想課題，才能開拓中國學的未來。值得注意的是，竹內好並非在理論的層次上引進中國視野，而是面對着活生生的歷史體驗，試圖介入現實的思想課題。

本文不能全面地探討竹內好的思想，但從前面的記述可以看出，討論他的中國視野，意義重大。下面，我想先討論竹內好的中國論的基本結構及其在思想界的定位，其次追溯竹內好思想的根源和演變過程，最後思考竹內好思想的邊界。現在討論50年代初竹內好的中國觀，其意義首先在於重現佔領時期日本思想界豐富的內涵；不但如此，通過這種探討，我們還可以思考處理戰爭體驗、變革戰後知識份子的另類途徑。換言之，他留給我們的最大遺產，是處理歷史體驗和知識份子立場之間的方法。雖然竹內好已經過世二十多年了，但我相信，他的思想在後冷戰的今天還未過時。

二

《現代中國論》一書收錄了九篇文章，其中最後的〈何謂近代〉一文，筆調相當抽象；相反，其他八篇都有很具體的話題。本文先看看處理具體話題的第一篇文章〈日本人的中國觀〉。

1950年代初，竹內好說：「為了從戰爭的體驗中重構自己，戰爭回來後，我有意識地重讀一遍魯迅。」藉引進以魯迅為中心的中國視野，竹內好試圖改變日本知識份子的思想結構。在他看來，現代日本的歷史經驗離不開中國問題，處理好日本在中國所犯的歷史錯誤，才能開拓中國學的未來。他留下的最大遺產，是處理歷史體驗和知識份子立場之間的方法。

1950年，日本共產黨受到批判，引起黨內路線鬥爭。對此，竹內好批評他們依靠權威、游離於日本國民基礎的態度。日共只看表面的意識形態對立，不能注意底流民族意識的看法。這反映出包括日共在內的日本思想界不能產生自己的思想。竹內好認為現代日本人沒有看透中國人民的國民意識，看錯了中國的現代性。

該文評論日本媒體對國民政府前任行政院長張群來日的報導。重要的是這篇文章的發表日期，它起先載於《展望》雜誌1949年9月號，後來收入1951年9月出版的《現代中國論》一書裏。竹內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前前後後，選擇寫國民黨官員張群的訪日事件，這並不是自然的事。這時，日本大部分媒體都在追蹤中國共產黨的動向，況且竹內好本人也支持毛澤東的路線。在這樣關鍵的時期特意提起張群，竹內好當然有其用意^③：

國民政府高官張群來日，去年還有轟動媒體的新聞價值。雖然他以「個人的資格」發表講話，全文也在報紙上刊載了。今年會怎樣呢？日本報紙去年都願意聽作為權威人物的「政府高官」談講和問題、貿易問題、外交問題，甚至「中國人民的對日感情」，但今年決不會理睬張群，而只會注意毛澤東對同樣問題的看法。這種態度不但對不住張群，而且對我們也是一個不幸。因為這種依靠權威的態度——不看真理，只看發言者表面的社會地位而注意其發言——正是張群所批評的日本的癌症，也是他作為中國國民希望日本國民自己擺脫奴隸狀況的要點。

這段話非常清楚地表現了竹內好的意圖。顯然，他並沒有輕視講和問題、貿易問題、外交問題，甚至「中國人民的對日感情」；恰恰相反，他在文章中反覆強調中國人民的「國民感情」，為了準確了解中國人民的感情，更需要以不靠權威、只求真理的態度。竹內好特別痛恨意識形態先行的態度。他在這篇文章裏，以最嚴厲的態度批評日本共產黨。竹內好決不

是簡單的反共主義者，他跟一些日本共產黨人士保持着良好的人際關係，而且對日本共產黨懷抱一定的希望。但是，在他的眼裏，日本共產黨也跟其他媒體一樣犯了錯誤，這個錯誤是日本革命的致命弱點^④：

《赤旗》為甚麼犯了錯誤？我想這是因為日本共產黨只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對立的層面上觀察中國革命，沒有看到底流的民族革命的能量。我想這樣的看法或許反映了日本共產黨本身游離於日本的國民基礎。但這點我不敢斷言說死。

1950年，日本共產黨被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批判，引起黨內的路線鬥爭。對此，竹內好曾撰文批評他們依靠權威、游離於日本國民基礎的態度^⑤。當時，竹內好屢次批判日本共產黨，並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他批判日本共產黨只看表面的意識形態對立，不能注意底流民族意識的看法。這個批判引發他對日本現代性的深刻反思：日本沒有真正的思想，因為日本只能從外部借來現有的觀念，自己沒有產生自己的思想。竹內好說，包括日本共產黨在內的日本思想界不能產生自己的思想，所以不能看透中國問題的要點，錯誤地評估中國的形勢。

第二，竹內好凸出強調國民感情。50年代前半期，他提倡「國民文學」，引起了一系列的論爭。他提倡「國民文學」的原因就在於日本人沒看透的中國人民的國民感情。後來，竹內好被稱為「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凸出「國民」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現代日本人沒有看透中國人民的國民意識，看錯了中國的現代性，從這個基礎上凸出「國民」的重要性。顯

然，竹內好並非簡單地提倡「國民」概念，他提出的「國民」概念是跟日本人沒看透的中國人民的底流意識結合之後才出現的。換言之，他主張為了建立日本真正的「國民」意識，更需要越出日本一國的範圍，認真直面「他者」的底流意識。

《現代中國論》一書的第二篇文章〈中國的抵抗運動〉，則通過介紹林語堂的小說《京華煙雲》來正面處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問題。這篇文章的發表日期也值得注意，該文起先載於《知性》雜誌1949年5月號，後來收錄到《現代中國論》一書裏，也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後的時期發行。抗戰時期，林語堂在美國從事抗日宣傳活動，1949年還在美国繼續寫作，他的政治立場明顯地支持蔣介石，反對毛澤東的路線。竹內好對林語堂的評價不那麼高^⑥：

總而言之，從中國文學今天的成就來看，林語堂的這篇小說不算是優秀的小說作品。相比茅盾從《子夜》走到《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發展，我們不難明白這一點。有人說這篇小說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但今天的中國人民會拒絕這種看法。美國人或許喜歡看，中國人很可能不太喜歡。

竹內好指出林語堂的小說是為美國人寫的，並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表現。嚴格來說，林語堂的小說是宣傳抗日的文章，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人民的感情世界。雖然如此，這時候竹內好強力推薦林語堂的小說，不但多次撰寫介紹林語堂的文章，還自己動手翻譯他的小說。他認為《京華煙雲》這篇小說「有一點接觸現代，非常明確地代表了國民感情，這就是，它顯

示出戰爭初期的抗日民族意識」^⑦，書中表現出中國的民族意識是^⑧：

林語堂小說的第四十一章和四十二章裏，幾乎所有的篇幅都寫了走私和毒品。看了這幾章，日本人的我也不得不感到作者判斷的正確；日本人本來缺少道德意識，沒有世界市民的資格。

林語堂的小說揭示了日軍在中國走私和買賣毒品的活動，更顯示了中國人民對日軍惡行的反感。竹內好看完這篇小說後承受了強烈的心理衝擊，並啟發他在道德層面上的思考。換言之，由於他看到日本媒體從來沒有報導或者不願意報導的中國人民的深層意識，這令他開始反思日本人的道德意識。顯然，他思考的道德問題與日本人的「國民」意識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他的思想裏，「國民」意識不能不聯繫到道德意識：日本人要誠懇地面對中國人民的譴責，在道德層面上反思日本的現代性，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國民」意識。

在〈中國的抵抗運動〉一文的後半部，竹內好從林語堂談到毛澤東^⑨：

毛澤東與林語堂，在意識形態上立場相反。他們各自代表中國國民的最左翼和最右翼。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連接着這兩個點。他們能夠統一起來的物質基礎，當然是作為共同利害的民族獨立。

這段話顯示了竹內好支持毛澤東路線的最根本理由。他在《現代中國論》一書中反覆強調中國共產黨具有崇高的道德意識。從現在的視野來看，他對毛澤東的評價似乎太高，這個問題還要在本文後面加以討論。在

竹內好在〈中國的抵抗運動〉談到：「毛澤東與林語堂，在意識形態上立場相反。他們各自代表中國國民的最左翼和最右翼。……他們能夠統一起來的物質基礎，當然是作為共同利害的民族獨立。」顯示了竹內好支持毛澤東路線的最根本理由。

此要確認的是，竹內好從毛澤東的思想看到改變日本知識份子的思想資源；他試圖通過反對日本媒體中通行的中國觀，介紹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深層意識，從而介入日本戰後的思想空間，建立起越出一國視野的「國民」意識。

三

竹內好在《現代中國論》一書中責備日本通行的中國觀時，時常批評日本人的觀念沒有變化。在他看來，戰後的日本人沒有反省戰前的中國觀，侵略中國時期的觀念一直延續到50年代。他引進中國視野來批判日本知識份子，最根本的原因，是要深刻反思戰爭，充分反思戰前日本人的中國觀，認真反思戰前日本人跟中國人的交往方式。竹內好嚴厲批評日本文學團體邀請中國詩人開的座談會時寫道^⑩：

儘管文學家與文學家相會，談論文學的問題，卻產生不出心靈碰撞的閃爍，這究竟是為甚麼？說得極端一些，我從這個座談會想到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竹內好在此談起戰爭時期日本官方文學團體拉攏「大東亞」的文學家而召開的會議。其實，竹內好的這種態度並不是戰後才表明的，早於戰爭期間就已經萌芽，只是戰爭中他的立場沒有站穩而已。經過戰爭的折磨，他一步步磨練自己的思想，結果發展出戰後的思考。

七七事變剛剛發生之後，竹內好在1937年10月到北京留學。這是他的第一次長期逗留，並正好碰上激變的

時機。但是，他到達北京以後看到的卻不如他的想像^⑪：

我到了北京以後總是感覺逐漸地與戰爭拉開了距離。我多次反躬自問這就是現地的北京嗎？至少我所遇見的北京人，他們對於重建曾經失去的文化，可以說沒氣力，說得好聽些很冷淡。

竹內好的感覺有歷史原因。北京被日軍佔領後，不管政治家或文化人，大部分知識份子都南下了，北京成了一座空城。竹內好目睹了剛剛人去城空的北京城。當時他很可能不了解這些事由，只是感覺北京文化界的空虛狀況。竹內好的特點是，感覺北京「沒氣力」以後，就把注意力轉向自己一方。他接着寫道：「處理複雜的現象，這應該是人的首要能力。在這樣一個時代裏，孤立學問的權威才破壞得痛痛快快。」^⑫竹內好留學北京以前就對日本漢學的權威表示過強烈的不滿。目睹北京的現實後，他開始質疑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日本學界，認為日本漢學的權威無用，自己的學問也同樣無用。

竹內好在剛開戰的北京所承受的衝擊，很可能是其思想的產生根源。從此以後，他發展出幾條思想線索：第一，他開始懷疑日本侵略中國的意義，這個線索一直連續到戰後；第二，他開始避開留在北京的中國知識份子，因為他們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界的中心力量；第三，他反思自己學過的知識，更深刻地批判日本學界的知識制度；第四，他尋找能夠表達中國現實的語言，他認為過去的話語沒有用，所以從零開始摸索新的話語。顯然，這些問題一時解決不了，從此以後他便陷入了思想困境。

七七事變剛剛發生之後，竹內好在1937年10月到北京留學，目睹了剛剛人去城空的北京城，感覺北京文化界的空虛狀況。竹內好的特點是，感覺北京「沒氣力」以後，就把注意力轉向自己一方。他開始質疑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日本學界，開始懷疑日本侵略中國的意義。

1941年日本對美國發動「大東亞戰爭」時，竹內好覺得以此為契機能擺脫這個困境，寫了一篇宣言性的文章〈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赤裸裸地支持「大東亞戰爭」。從今天的視野來看，他的政治態度完全錯誤。雖然結果完全失敗，但在得出這結果之前，竹內好的思想脈絡還有值得探討的餘地。因為竹內好的思想雖然不正確，但帶有強度。這時，竹內好認真地面臨從日本侵略中國而出現的思想困境，從而希望以日本對美國開戰為轉機，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更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甚至「超克」亞洲的現代。問題是，他看不清「大東亞戰爭」與侵略中國的戰爭之間的相同性，也看不清中國人民對「大東亞戰爭」的看法。他看錯了形勢，從反面證明當時的竹內好思想混亂，同時急切地希望擺脫這個困境。總之，竹內好思想混亂的強度導致他支持日本對美國的戰爭，他在政治上的錯誤選擇，充分顯示他陷入了特別強烈的思想困境，擺脫困境的願望也非常強烈。

本文不準備深入探討〈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一文，而是想看看跟此文發表於同一期《中國文學》雜誌上的另一篇文章〈書寫支那〉。這篇文章通過批評日本文學家書寫中國的小說作品，清楚地顯示了竹內好的思想困境。他一概否定日本文人的小說作品之後，將矛頭轉向自己^⑬：

文學家把訪問支那以前早知道的事情，回國以後寫成作品，這能原諒嗎？事事都自己斷定，一點也沒有感到驚奇，都懂得很透徹，只是說明而已。……大膽地瞪支那回來的人，一個也沒有。大家都戰戰兢兢，從遠處小心地眺望。所以，看不到人的臉孔，只能看到「支那人」。這樣視力弱

的人算文學家嗎？沒有像魯迅那樣具有冷眼的人嗎？……前幾天，我喝得大醉，說出蠻不講理的話。我並不後悔自己說出罵人的話，但是，沒站在說得出罵人話的有決意的位置上，而說出蠻不講理的話，使我增添了苦惱，感到慘痛。

某種意義上，竹內好這篇文章的邏輯很混亂，不是有系統的論述。但不難發現，竹內好談論的問題其實是：包括竹內好本人在內的日本文學家，儘管運用文學的方法，還未能寫出中國的現實，換言之，日本沒有像魯迅那樣看透中國現實的文學家；同時，這篇文章又顯示竹內好的批判對象開始明確起來。他批判的不外是不接觸中國現實而自鳴得意的日本知識份子和沒找到適當思想位置的自己。顯然，這兩個批判對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第二年，即1942年，日本官方的文學團體日本文學報國會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日本文學報國會通過幾個渠道邀請竹內好和中國文學研究會參加這次大會，但竹內好堅決拒絕。這時候，他已經注意到中國人民對「大東亞戰爭」的看法，寫過：「一言以蔽之，支那人認為大東亞戰爭是支那事變的延長部分。」^⑭竹內好的批判意識更加明確了，他自然不會跟日本文學報國會合作。後來，他在一篇文章裏說明其理由^⑮：

我不認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是政治謀略行動。但是，大會負責人不了解現實的支那的文化荒廢，結果，他們難得的好意卻產生出反面的效果，這確實很遺憾。現實的支那的文化荒廢，幾乎接近虛無，想起來就使人戰慄。不考慮對方的肉體上的痛苦，就隨便舉辦節

1941年日本對美國發動「大東亞戰爭」時，竹內好寫了一篇宣言性文章，赤裸裸地支持「大東亞戰爭」，希望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甚至「超克」亞洲的現代。問題是，他看不清「大東亞戰爭」與侵略中國的戰爭之間的相同性，也不了解中國人民的看法。竹內好在政治上的錯誤選擇，顯示他陷入了特別強烈的思想困境，擺脫困境的願望也非常強烈。

當大部分的日本知識份子以西方理論為標準，衡量日本社會結構的時候，竹內好卻引進中國視野，質疑包括自己在內的日本知識制度。首先，他反省自己在戰爭期間不能深入中國現實，然後批判不去接觸中國現實的日本知識份子。最後，得知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的判決之後，他開始討論現代日本的道德問題。

日性的大會，這是通情達理的日本文學家不應該做的事，我感到很可恥。

文章的前半部說明竹內好拒絕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後半部，他在此為中國文化的「虛無」找到哲學性的用語表述。在這篇文章裏，他還說出一段哲學性的言詞：「勿塑造形象，而是以拒絕形象的態度使自己存活下去的文學精神。」¹⁶1942到1943年，竹內好對京都大學學者提倡的世界史哲學感興趣，因而研究西田幾多郎的哲學思想。當時他有許多文章都受到西田哲學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1943年所著的代表作《魯迅》。於是，竹內好通過哲學思考，逐漸地擺脫從1937年以來一直令他苦惱的思想困境，幾乎找到表達中國現實的話語。

1945年日本戰敗以後，整個日本思想界開始反省戰爭的歷史。竹內好跟一般的日本知識份子不一樣，經過戰爭期間的思想掙扎，他在哲學思考的層次上暫時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當大部分的日本知識份子以西方理論為標準，衡量日本社會結構的時候，竹內好卻引進中國視野，質疑包括自己在內的日本知識制度。首先，他反省戰爭期間不能深入中國現實的自己，然後批判不去接觸中國現實的日本知識份子。從這個基礎上，他尖銳地批評戰後知識份子忽略中國的態度。最後，得知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即「東京審判」）的判決之後，他再一次磨練自己的思想，開始討論現代日本的道德問題。在前面提過的〈中國的抵抗運動〉一文中，他反省戰爭中的自己時寫道¹⁷：

從微弱地傳過來的文學的動向，我發揮了一點想像。但當時沒有手段確認

它，何況未能把握整體的關係。……現在能夠作出判斷了。細節且不談，大致上這應當是事實。讓我領會了判斷準則的，是東京審判的判決。

最近，日本社會對東京審判議論紛紛，當時竹內好自己對東京審判的態度也相當複雜。值得注意的是，他看了東京審判以後，又把矛頭轉向自己，開始反省自己的道德問題。於是，竹內好將戰爭期間的反省和東京審判的問題結合起來，思考如何確定他獨特的思想位置。

四

《現代中國論》一書的最後一篇文章〈何謂近代〉，抽象地總結前面談過的種種問題。竹內好在戰爭期間的經歷和一直延續到戰後的思想活動，都集中地表現在這篇文章之中。〈何謂近代〉一文要討論的問題很多，比如，西方現代性的性質、西方的前進與東方的後退、日本的優等生文化與中國的劣等生文化、日本的轉向文化與中國的回心文化等等。所有問題都反映了戰後竹內好對世界史哲學的理解以及通過哲學思考而重新獲得定位的中國現代性。下文將會簡單地梳理〈何謂近代〉一文的核心概念之一——「抵抗」概念的思想脈絡。

竹內好自己說，「抵抗」概念是受魯迅的啟發而想到的。顯然，「抵抗」概念的根源也在於戰爭期間的思想活動。關於魯迅的抵抗，竹內好在〈何謂近代〉一文中這樣寫道¹⁸：

對我來說，認為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提煉出來的合理主義的信念是可怕的。與其說是合理主義的信念，毋寧說是

使得那信念得以立足的合理主義背後所存在的某種非合理的意志的壓力是可怕的。……就在此時，我與魯迅相遇了。而我看到，魯迅以身相拼，隱忍着我所感受到的恐怖。或者毋寧說，從魯迅的抵抗之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感覺的線索。我開始思考抵抗的問題，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竹內好回想戰爭中的思想活動，寫下對合理主義的恐怖感。這篇文章中的「合理主義」一詞，意義相當複雜。首先，它象徵西方的現代性以及信仰西方的日本現代性；其次，它意味着西方式的知識制度，在此他對包括自己的學問在內的西方式知識制度加以深刻的批判。不僅如此，他還批判「合理主義背後所存在的某種非合理的意志的壓力」，他的批判不限於表面的制度，還深入支撐這個制度的深層結構。某種意義上，他對「合理主義」的批判，與其說表現了他戰時的思想狀態，不如說反映了他戰後的思想發展。但至少，這顯示了竹內好一直追求的核心問題。

更重要的是，文章後面的話——「我與魯迅相遇了」。竹內好敘述自己與魯迅的關係時，不寫「讀解」卻寫了「相遇」一詞。由此可見，竹內好並不是外在地解釋魯迅的文本，恰恰相反，他通過心靈的碰撞，內在地理解魯迅所面臨的困境。所以，他說「從魯迅的抵抗之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感覺的線索」，換言之，與魯迅「相遇」之後，竹內好重新整理自己的思想，獲得了比較明確的思想課題。

竹內好通過魯迅所形成的「抵抗」概念，首先表現在1943年寫成的著作《魯迅》一書裏。竹內好寫好了《魯迅》的原稿之後，馬上應徵入伍。這本著作是由他的學友武田泰淳校對之

後，於1944年出版發行的。竹內好自己說，這本著作像他的遺書^⑨。顯然他不是著作裏描述客觀的魯迅形象，該書是他與魯迅「相遇」的成果。在《魯迅》一書裏，竹內好這樣說明自己的文學觀^⑩：

游離於政治的，不是文學；通過在政治中覓得自己的影子，然後衝破那影子，換言之，通過對於（文學自身）無力的自覺，文學才成為文學。政治是行動，因而與其對壘的也必須是行動。文學是行動，不是觀念，但是那行動卻是以行動的異己化為前提的行動。……總之，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是矛盾的自我同一性。

文章最後一句「矛盾的自我同一性」，如他自己說，是西田哲學的用語，這段話明顯地受到西田哲學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竹內好運用西田哲學的用語獲得了獨特的文學觀：他認為文學對政治完全無力，但通過自覺到無力、不去行動的方式，文學反而發揮行動的力量。這種文學觀所界定的文學才是魯迅的文學，也是竹內好追求的文學。竹內好對「無力」和「行動」的解釋，明顯地揭示了他在1943年的心理狀況：當時他面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又窺見與他隔離的中國的現實，自覺自己的無力，於是，他認真地尋找自己的思想位置。他在此獲得的文學觀原理一直延續到戰後。我們接着看〈何謂近代〉一文中的一段話^⑪：

奴才拒絕奴才的位置，同時拒絕解放的幻想，換言之，奴才保持着奴才的自覺繼續過奴才生活，這才是「人生最苦痛的」夢醒來的狀態。這個狀態是，無路可走但偏偏要走，或者不如

竹內好的文學觀是：「通過對於（文學自身）無力的自覺，文學才成為文學。政治是行動，因而與其對壘的也必須是行動。文學是行動，不是觀念，但是那行動卻是以行動的異己化為前提的行動。」竹內好認為文學對政治完全無力，但通過自覺到無力、不去行動的方式，文學反而發揮行動的力量。這種文學觀所界定的文學才是他追求的文學。

說，無路可走所以要走。他拒絕成為自己，同時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任何東西。這就是魯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魯迅得以成立的、「絕望」的意味。絕望，在行進於無路之路的抵抗中顯現；抵抗，作為絕望的行動化而顯現。把它作為狀態來看就是絕望，作為運動來看就是抵抗。在此沒有人道主義插足的餘地。

竹內好引用魯迅的一篇寓言來說明「抵抗」的概念：奴才自覺到自己的位置，於是不作簡單的反抗，反而發揮真正的反抗力量。這種「抵抗」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抵抗，而是不簡單地行動的行動，徹底絕望的顯現。他撰文時日本正被美軍佔領。他為日本的獨立談起「抵抗」概念，換言之，他主張日本應該通過魯迅式的「抵抗」發揮真正的行動力量，爭取獨立。

這段話引用了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中的一篇寓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來說明「抵抗」的概念。其實，這裏表現的跟寫於1943年的《魯迅》一書幾乎一樣。他應用《魯迅》一書的文學觀，解釋奴才和主人的關係：奴才自覺到自己的位置，於是不作簡單的反抗，反而發揮真正的反抗力量。這裏的「絕望」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絕望，是對絕望的絕望，連絕望都不能做的徹底的絕望。竹內好在這個層次上形成了「抵抗」概念。顯然，他的「抵抗」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抵抗，是不簡單地行動的行動，徹底絕望的顯現。

雖然如此，《魯迅》一書與〈何謂近代〉一文在語境上的區別也很清楚。竹內好撰寫《魯迅》一書的時候面對日本向中國發動的戰爭，而撰述〈何謂近代〉一文時面對的是日本被美軍佔領的局面，時代的思想課題完全不同。他在〈何謂近代〉一文裏為日本的獨立談起「抵抗」概念，換言之，他主張日本應該通過魯迅式的「抵抗」發揮真正的行動力量，爭取自己的獨立。顯然，在竹內好的思想裏，「抵抗」概念和前面談過的「國民」概念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總而言之，竹內好在戰爭期間目睹了中國活生生的實例以後，陷入了思想困境，經過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哲學思考，再配合戰後日

本的思想課題，他逐漸找到以「抵抗」和「國民」等概念為主的獨特思想位置，對現代日本的西方中心主義、一國主義的思想空間產生重要影響。

五

本文前面談過竹內好的中國觀至今還有探討的價值。但同時，不能不承認他的中國觀存在嚴重的缺陷，這就是對毛澤東的評價。竹內好屢次談起代表現代中國的三個人物：孫中山、魯迅和毛澤東。直到晚年，他對毛澤東的評價基本上沒有變化。雖然，他在1967年與武田泰淳座談時說過：「撰寫《毛澤東傳》時，我的觀察不準確。那是1951年的文章，我寫過毛澤東不會當偶像」^②，批評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總的來說，對毛澤東的思想幾乎沒有批評。

50年代初，竹內好高度評價毛澤東主要有兩點理由：第一，他肯定毛澤東提倡的「新民主主義」。《現代中國論》一書中寫道^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除掉賣國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大地主以外，農民、工人、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中間階層等種種階級的廣泛的聯合政權。所以，他們的革命不是共產主義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一種新民主主義革命。

竹內好相信中國共產黨不會實行獨裁，因為這是「聯合政權」。從今天的視野來看，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獨裁是歷史的事實，但50年代初，還沒全面開始土改、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竹內好的看法尚有足夠的根據。當然，他的看法也避免不了一點偏差。竹內好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

的感情，所以不去看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之間的關係，導致他過高地評價「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性質。

第二個更重要的理由，是他對思想改造運動的評價。竹內好高度評價當時對中國知識份子開展的思想改造運動。1951年，他寫了毛澤東的評傳，儘管當時的史料並不充分，他卻相當深入地把握到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問題。問題是，竹內好將他對根據地的理解擴大到思想改造運動之上²⁴：

根據地的法則都會適應一切人類活動，不管個人的或集團的。自己的內部不具備根據地的人，不能當革命人。根據地的根源是權力的奪取。所以，從事革命的個人也需要實現價值的轉換，換言之，必須完成思想改造。

竹內好在根據地理論上找到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然後，把根據地的「權力的奪取」大膽地轉化為個人的「價值的轉換」。顯然，「權力的奪取」和「價值的轉換」層面不同，集團和個人問題不同，戰爭中國家的出路和建國時期個人的命運更不同。竹內好很可能依靠兩個判斷提出這種看法。第一，他重視思想改造中知識份子的自願性。他在1951年的文章中這樣寫道²⁵：

我們不免發出一個疑問：學習運動，如果沒有受到法律上的強迫，也會遭受一種心理上的壓迫。我相信，肯定有心理上的壓迫，有相當沉重的壓迫。但是，漩渦之中的人對這種壓迫不覺得不快，反而充滿喜悅。

竹內好的這個判斷，當然有一定的根據。50年代初，經歷思想改造的中國知識份子寫了許多文章，顯現了他們的自願性，其中一部分還被譯成

日文。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起先載於日本著名的綜合雜誌《改造》1951年7月號，然後收入《日本意識形態》一書裏。顯然，這篇文章是以日本知識份子為對象，討論日本知識份子的問題，並不是談中國問題。換言之，竹內好認為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決不是異國的事件，同時也是戰後日本知識份子自己的思想課題。

第二，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上看到與自己思想相近的因素。他在說明中國思想改造運動時寫道²⁶：

思想改造的根本在於放棄自我主張。這才能走上獲得真正自我的道路。……每個人獲得真正的獨立，換言之，每個人發現整體與部分的調和。固執自我的人是失卻獨立的人，因為他的自我陷入孤立，沒有放在整體性調和裏。

這段話的邏輯跟竹內好通過哲學思考形成的觀念幾乎一樣：以放棄自我的方式反而獲得真正的自我。而且，他在此談的「獨立」與對日本知識份子提出的「抵抗」、「國民」等概念幾乎相同。由此可見，竹內好在同一層面上思考中國思想改造運動和戰後日本的思想課題。簡單地說，他希望對日本知識份子加以「思想改造」。

對思想改造運動的評價構成了竹內好思想的核心，因為他認為思想改造運動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而且思想改造運動的原理可以適用於日本知識份子。前面談過，竹內好相信中國共產黨道德意識特別崇高。在他的思想裏，中國共產黨的崇高道德意識和對思想改造運動的高度評價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換言之，兩者發生了互相依靠的關係，如果一方不存在，另一方就失卻自己的根據。如

竹內好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他的中國觀的嚴重缺陷。他肯定毛澤東提倡的「新民主主義」，相信中國共產黨不會實行獨裁。從今天的視野來看，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獨裁是歷史的事實。竹內好高度評價當時對中國知識份子開展的思想改造運動。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上看到與自己思想相近的因素，他希望對日本知識份子加以「思想改造」。

今，經歷過大躍進、文革等等的大浩劫，人們不能無條件地信賴中國共產黨的道德意識，於是，竹內好思想的缺點也凸顯出來。許多日本學人批評竹內好太重視對日本思想的質疑，結果脫離中國的現實。他們批評竹內好的根據就在於這點。

當然，不能不考慮50年代初期的語境。當時很難預見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未來。至少在中國大陸，大部分人支持毛澤東，把毛澤東當作希望。

竹內好看到中國的潮流，緊貼中國的這個現實，作出判斷。竹內好一向關注中國現況和一般日本人從來不曾注意的中國的底流意識。竹內好高度評價毛澤東的根據是他對中國現實的獨特態度，我們不能簡單地從今天的視角來批評竹內好脫離中國的現實。

問題還是思想的強度。他以最大限度來估計中國現實的衝擊力，把它引進給日本思想界。這時，他所追求的與其說是思想的正確，不如說是在尋求思想的強度。值得注意的是，他尋求思想強度的時候，往往失卻政治正確性。戰爭期間支持「大東亞戰爭」是一例，過高評價毛澤東思想也是一例。他的思想裏同時存在對日本思想引起衝擊力的強度與政治錯誤的可能性，換言之，強度與錯誤的合流形成竹內好的思想。

當代亞洲的語境裏，50年代初期的思想資源幾乎都忘卻掉了。而且當代日本社會對中國現實的感受力愈來愈淺薄。現在竹內好思想的意義特別重要。但同時，也不能忽略他的思想裏面有政治錯誤的可能性。既然難免有錯誤的因素，我們就須要統統接受竹內好思想的強度與錯誤的可能性。竹內好留給我們的最大責任也許是，接受竹內好思想的精神準備，以及精神的強度。

竹內好以最大限度來估計中國現實的衝擊力。他所追求的與其說是思想的正確，不如說是在尋求思想的強度。可是，他往往失卻政治正確性，如戰爭期間支持「大東亞戰爭」、過高評價毛澤東思想。強度與錯誤的合流形成竹內好的思想。當代亞洲的語境裏，50年代初期的思想資源幾乎都忘卻掉了。竹內好留給我們的最大責任也許是，接受竹內好思想的精神準備，以及精神的強度。

註釋

- ① 《文學》，1951年6月號，頁467、468。
- ② 《現代中國論·中國新書版·あとがき》，收入飯倉照平等編：《竹內好全集》，第四卷（東京：筑摩書房，1980），頁173。
- ③④ 〈日本人の中國觀〉，《竹內好全集》，第四卷，頁4；6。
- ⑤ 請參照〈日本共產黨論〉，收錄於《日本イデオロギイ》，《竹內好全集》，第六卷。
- ⑥⑦⑧⑨⑩ 〈中國のレジスタンス〉，《竹內好全集》，第四卷，頁18；20；30；39；28。
- ⑪ 〈政治と文學の問題〉，收錄於《現代中國論》，《竹內好全集》，第四卷，頁103。
- ⑫⑬ 〈北京通信·一〉，《中國文學月報》，第33號（1937年12月），收入《竹內好全集》，第十四卷，頁110；111。
- ⑭ 〈支那を書くということ〉，《中國文學》，第80號（1942年1月），收入《竹內好全集》，第十四卷，頁281。
- ⑮ 〈新しい支那文化〉（1942年9月），《竹內好全集》，第十四卷，頁429。
- ⑯⑰ 〈現代の支那文學〉（1943），《竹內好全集》，第十四卷，頁459；461。
- ⑱⑲ 〈近代とは何か〉，《竹內好全集》，第四卷，頁144；156-57。
- ⑳ 《魯迅·創元文庫版·あとがき》，《竹內好全集》，第一卷，頁172。
- ㉑ 《魯迅·政治と文學》，《竹內好全集》，第一卷，頁143-44。
- ㉒ 《狀況的：竹內好對談集》（東京：合同出版，1970），頁291。
- ㉓ 《新中國の精神》，《竹內好全集》，第四卷，頁92。
- ㉔㉕ 《評傳·毛澤東》，《竹內好全集》，第五卷，頁313；315。
- ㉖ 〈中國知識人の自己改造〉，收錄於《日本イデオロギイ》，《竹內好全集》，第六卷，頁132。

鈴木將久 1967年生於東京。1997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明治大學副教授。發表〈上海：媒介與語境——讀《子夜》〉等論文多篇。